「這不是藝術，而是沉甸甸的歷史」——記述王海寧與他筆下的抗戰紀念章

明天，又是一年的「八一五」——日本二戰投降日，我們回看那些曾經在戰場上奮力拚搏的中國軍隊老兵。他們的胸前，掛着金光閃閃的勝利紀念章，那是他們一生的榮譽。不久前，記者專訪了設計中國內地國民紀念章的美術設計師王海寧，聽他講述自己筆下設計出的那枚金銅之物、歷史之花。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老戰士熊世超，直到去世，都一直佩戴着紀念章

■王海寧探訪中國遠征軍老兵劉世教

■王海寧的「兵」字構圖

■V字勝利紀念章

■王海寧為民間義工組織「互助」設計的紀念章

■王海寧筆下的抗戰時期中國軍隊

「我只是一個草根藝人。」雖然內地的抗戰老兵胸前，差不多都掛上了由義工們致送、王海寧親自設計的紀念章，但王海寧依然如此自白他的創作。為了這份創作，他放棄了經商，但也選擇了新的道路。他最引以為傲的，永遠是掛在老人們胸前的那份歷史榮譽。

這是軍人的榮譽

作為一個火辣辣的湖南人，王海寧向記者坦言，他曾經當過兵，這為他後來設計抗戰勝利紀念章，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思路和財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部隊參軍時，獲得過兩次三等功和一次二等功嘉獎的他，深深體會到：榮譽，對一個軍人是如此重要。

紀念章的設計，是在病榻前完成的。王海寧說，二〇一〇年自己去一個偏遠的深山地區看望一位抗戰老兵，結果發生了車禍，摔斷了腿。在送醫治療後，海寧想到的，還是自己受託要完成的紀念章設計之事——「這種車禍之傷，與那些老人在戰場上的流血相比，真的不算什麼。」——王海寧對這件事的回憶微微帶過，不過，他說，那時已經是二〇一〇年的六月了，要趕在八九月的時間，完成設計並交付製作，以盡快送到老戰士們的手中。這是他當時心中焦急的原因。

設計紀念章，這份差事在王海寧看來，似乎有些搶時間的味道。「中國人逢五逢十，是大日子。小到個人生日，大到國家慶典，都是如此。問題是，這些老戰士那時至少八十多歲了，大多都等不到二〇一五年的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了，所以我要加緊趕工。」與內地的民間關愛老戰士團隊一拍即合，王海寧的創作成為了對老戰士們物質和精神關懷的一部分。

「對細節的執着，不是矯揉造作，而是作為一個設計師的職業道德。」王海寧說，今天的國人回看當年的國史，完全無法體會到時代的艱辛和不易。以抗戰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很多，但是要麼是仇恨的傳遞，要麼充滿毫無人文關懷的搞笑，而對戰爭的殘酷、生命珍貴的思考缺乏表現。因此，在設計紀念章的時候，他想將歷史的真實元素融會其中——「比之於自豪和勝利喜悅，我們更應反思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本。因此，紀念章中的每一組意象，是如此重要。」這是王海寧的設計告白。

充滿歷史意涵的細節設計

意象的重要體現在何處呢？王海寧告訴記者，他所設計的紀念章，每一個數值、每一個圖案、每一種符號、每一類色調，都有特別的考量、寓意和內涵。其中，V字勝利紀念章，是他最引以為傲的一個設計作品。這是一款為了紀念二〇一〇年抗戰勝利六十五周年而完成的作品，也是目前中國內地民間義工團隊使用較多的一款紀念章，由綬標和紀念章本身兩部分組成。

綬標，由藍、黃、紅三種顏色構成。每一種色彩的分割長度是14mm，三種顏色相加，一共是42mm；而綬標的寬度是31mm。每一個色彩，每一個數字，在王海寧的心目中，都是有特殊含義的。十四，代表着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勝利的十四年歷程；而三十一，恰好就表示一九三一年的東北淪亡；四十二，代表着一九四二年，中國軍隊第一次進入緬甸作戰，因為這是中國近現代以來，少有的與盟邦配合的出國作戰行動。而三色的藍、黃、紅本身，則分別象徵國家的軍隊，華夏的土地與國民的鮮血。

紀念章通高90mm，寓意着中國人對久久祥和之意的期盼。紀念章的正面，是大大的V字圖案。V造型作利劍，由大、小、粗、細四組V組成，象徵中國當時的四萬萬國民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勝利萬歲。謂之「勝利紀念章」，V理念形簡意賅且深具國際識別和歷史意義不言而喻。

整個紀念章外徑55mm×55mm；諧音「我我」，八人形挽手團抱，表示當時的國人忘我犧牲的團結精神。紀念章正面內圓徑規格為37mm×37mm，象徵一九三七年爆發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章背面小內圓徑29mm×29mm，象徵打響中國全面抗戰第一槍的第二十九軍。

老戰士不能失去的摯愛

透過紀念章，王海寧將自己的藝術設計品牌，稱為「海形象」，並進行了工商登記註冊。什麼是「海形象」？王海寧的思考，就是歷史、國民、草根、公義。「我很多時候沒有勇氣去直面老戰士們拿到紀念章那一刻的雙目，因為我們無論怎麼做，都已經無法彌補這些老人們應該獲得的尊重、肯定、榮譽和補償。我只能盡自己的微薄之力。」

紀念章之於那些曾經在對日抗戰中付出的老戰士們而言，是一份畢生的肯定和讚揚。他們將這枚來自王海寧工筆設計出來的紀念章，視為自己的護身符、褒揚令、旌忠狀。風燭殘年之際，很多老戰士希望的，是如今的國人，能夠知道、了解他們當年的歷史；能夠讓自己青春時期的努力不至於付之東流。「說得直白些，我為了老戰士們設計這些紀念章，就是為了讓他們開心。老人們不求榮華富貴、錦衣玉食，所求的，僅僅是能夠在不多的時光中，有尊嚴地度過餘生。」王海寧激動地告訴記者。

對於中國軍隊的老戰士而言，紀念章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熊世超，是一位已經過世的老人，晚年拮据地生活在雲南邊陲。曾經青春壯年時的他，是一名滇西對日作戰中的中國軍隊戰士。曾有民間義工僱了一台轎子，抬着他重回當年的松山戰場。往事歷歷在目。當年關懷老戰士的民間義工，進入到他所在的那個閉塞的村莊，給他送去了生活資助款，當然，也送上了王海寧設計的那枚珍貴的紀念章。熊世超從那之後，每天都將紀念章掛在胸前——出門、居家莫不如此。消息傳開，村民們紛紛感慨：老人富貴了。

後來，熊世超老人的家被偷竊了。失竊之物，除了現金，也包括那枚讓村民們覺得熊世超變「富貴」的紀念章。老人精神崩潰似的對每一個來人說：「偷我的錢就算了，但是不能偷我的紀念章啊，沒有了紀念章，我是不敢上街出門的，別人看到我不戴紀念章了，又會認為我是壞人，會打我的，我害怕。」在失去紀念章的那段日子中，熊世超每天是在緊張、惶恐和絕望中支撐過來的。不久，民間義工給老人補發了一枚紀念章，他的心情才恢復平靜。而老人離開這個世界時，胸前還是掛着那枚紀念章。

在河南省的一些地方，每當有中國軍隊的老戰士離開這個世界，他們的家人，都會將紀念章放在屋子入口的橫樑上。老人遺體火化之後，也會擺在骨灰盒上。毫無疑問，紀念章已經成為了這些老人與他們家人的一個象徵、一種身份。

「所有當年參加過戰爭的老人，終將離開這個世界，能在垂暮之年，為他們做些事，是我的責任。紀念章不是藝術品，而是沉甸甸的歷史。老戰士佝僂的身影，是我永遠的創作動力，我期待用自己的作品，補回他們的苦、辛酸和淚——為了民間、為了草根、為了千千萬萬最需要關注與幫助的中國人。」這就是王海寧對公義與藝術的理解和感悟，也是他今後要繼續走的一條人生設計之路。

■王海寧為中國內地民間老兵關愛義工組織設計的LOGO

關愛抗戰老兵

記者手記：勝利日的文化警醒

明天，我們又將迎來八月十五日，這個對中國人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1945年的這一天，日本通過一次所謂的「玉音放送」，結束了對亞洲太平洋的戰事，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中國人終於迎來期待十四年的和平曙光與勝利喜悅。

從1945年的那一天開始直至今日，在中國甚至整個華人社會，很多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重新闡述中國人在那場戰爭中的生活、命運與角色。毫無疑問，藝術家、知識分子是這場歷史回溯運動中極為重要的一員。畢竟，文人對歷史的感悟，時常會影響大眾對歷史的評判和認識。口述歷史的推動，抗戰紀念章的設計、製作與發放，戰爭遺跡的整理和修繕，影視劇的創作與公映，這一切，都是文藝界、知識界在回溯、還原以及複製那段中國史、世界史的浩瀚使命中，所要完成的任務和職責。

隨着歲月的推移，這場戰爭的見證者、參與者將一個一個離我們而去。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去認識那場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戰爭？前不久，中國輿論界對所謂的「抗日神劇」進行了批判——因為這類藝術作品，對當年的侵華日軍，雖進行了嘲諷和挖苦，但將日軍塑造成極度愚蠢的「傻帽」；中國人對日軍的抵抗，則顯得過度幽默、戲謔和輕鬆。中國的不少輿論領袖和知識界就批評：這種作品，完全無視當年的戰爭殘酷性，反而是對歷史的一種另類的扭曲，也是對戰爭中逝者的不尊重，缺乏生命的關懷、和平的渴望以及人性情操的塑造。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以抗戰為題材的藝術作品，其人文內涵的提升，仍舊需要進行巨大的改進。

畢竟，當年的那場戰爭，令太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太多的人失去了家園和親人。而我們來自東洋的對手，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確實強大過我們的國家。復旦大學的一位學者，曾經在其一部講述中日關係的書中表示：哪怕是到了1945年初，中國方面，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覺得距離最後勝利，還有數年時間的路要走，大家並沒有意識到再熬上大半年，就可以得到和平。同樣，香港一位日本問題專家不久前也曾對記者表示：在不少日本人的思維中，當年那場戰爭，日本只是敗給了美國，日本的錯誤是不該與美英等西方列強進行太平洋戰爭。這或許就是一個嚴酷的現實——無論國人心中是否願意接受。在又一個「八一五」勝利日來臨之際，中國人確實不能夠因為沉浸在歷史的勝利喜悅中難以自拔，而忽略了現實中的環境變化與挑戰。因為，對於這種「勝利」的解讀，日本的部分人是存在着不同定義和思維的。

這種時代印跡之下，作為中國的文人和藝術家，應當怎樣去詮釋當年的歷史，其實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換言之，文人和藝術家，應當用怎樣的方式，讓國人大眾從那場戰爭的硝煙中汲取到進步和自覺的動力，是最為關鍵的努力方向。國家的強大，在於國民的強大。而國民的強大，則來自於啟蒙、文明開化、自我主體性的文化與身份自覺，以及公民素養的培育等等。

如果從更加久遠的歷史長河中去審視中日兩國的比較脈絡，則從歷史小說《阪上之雲》兩個片段的描寫中，便能夠窺探出這種歷史文化的演變差別。《阪上之雲》中，清末甲午戰爭時期，遼東的中國百姓不知日本軍隊為何人，直到親人被殺害，始有報仇之念；而隨軍擔任記者的日本詩人正岡子規，為了如實記錄日軍在中國的暴行，與日軍軍官發生了衝突。而在該小說的開頭，有這樣一段描寫日本明治維新的文字：「這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指日本），正迎來它的開化期……因為有了改革，才有了近代意義的國家，有了真正意義的國民……無論家庭出身為何，只要努力，就可以成為軍官、教師、官吏。時代的豁達，便來自此種樂天主義。」

■獲得紀念章的中國老戰士廖榮昌快樂地行軍禮

明天，勝利之日，我們應有深刻的文化警醒，而不能輕易被68年前的勝利沖昏頭腦，更不應當麻醉在物質的享樂中，讓物慾蒙蔽雙眼，從而將價值理性、悲天憫人、人文啟蒙的美德視為偏激和異質。文明開化、思想革新是沒有盡頭的。全人化的美育和博雅精神塑造，並非被外在的身份、文明所綁架，而是一種真正意義的民族情、同胞愛。縱使在我們自己的周遭，有再多未能體悟到世界大勢的同胞，則也應本着「每分鐘寬容一百次」的博大胸懷面對之，而非隨波逐流而起舞。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中國的文人、藝術家、知識分子任重道遠。

文、圖：徐全